

农业农村部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 通 讯

第 5 期（总第 377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1 年 5 月 5 日

- 
- ◆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郭书田(1)
  - ◆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丁玉华(6)
  - ◆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东亚农业·····温铁军(11)
  - ◆ 天价“洋种子”背后的种业之痛·····王 建(16)
  - ◆ 一个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韩东屏(20)
  - ◆ 再生农业：恢复土壤，助力碳中和·····丛源勃(22)
  - ◆ 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工程·····王正谱(25)
  -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郑风田(27)
  - ◆ 五大变化、三大挑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形势·····张红宇(30)
  - ◆ 实现“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发展纲要不能回避的三大问题·····郭书田(33)

#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郭书田

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奋斗历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世界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三个方面，都具有划时代与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东方文明发源地之一。自公元一世纪至十八世纪，在全球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成就辉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漫长的年代，有几次大治较长的时期，汉代时间为 481 年，唐代为 393 年，清代为 275 年。在汉代刘邦之后，有文景之治；唐代在李渊之后，有贞观之治，清代在顺治之后，有康乾之治。这三次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黄金时代”，扬名于世。但进入十九世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发展壮大，开始向外扩张。这时，中国清末王朝仍处于闭关自守的沉睡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是弱肉强食的好地方，1840 年“鸦片战争”，用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成为他们侵略、瓜分、掠夺的对象，纷纷单独或联合起来举兵向中国进攻，强迫已经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张像秋海棠叶的美丽版图，被他们肢解割让了大片国土，使中国人民陷入被压迫、凌辱的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还被他们辱为“东亚病夫”。这种状况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一些爱国先驱者挺身而出，纷纷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与腐败无能、卖国求荣政府的大旗，开展各种抗议示威活动。义和团手持长矛与大刀，反击英美侵略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广西金田举行起义，推行“天朝田亩”办法，向封建土地制度开火。康有为、梁启超实行戊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谭嗣同六君子被杀。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虽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军阀混战而夭折。这些举动虽然先后失败，而民怨沸腾，对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挥了积极作用。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要把曾被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割让给日本，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大学以蔡元培校长为首的、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鲁迅参加领导的学生，掀起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精神成为唤起中国人民觉醒的思想武器。一些西方人士说，“东亚的睡狮正在觉醒”。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开展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为主轴的新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学派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派，法国的民主科学派、俄国列宁的十月革命派，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派，以及反对新文化的国学派，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像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自由辩论，十分活跃，各抒己见，各执一端。在这种形势下，自《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与传播以来，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海内外知识分子，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纷纷在各地建立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精心策划（南陈李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纲领与党章，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由12名代表参加会议（苏共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列席），代表着50多名共产党员，在思想上、组织上形成统一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堡垒，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的幽灵由欧洲转向亚洲中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 二、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在建党初期，必须有自己的宣传武器——刊物，也就是党的喉舌。在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同盟”时，创办了《莱茵报》；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时，创办了《火星报》；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新青年》，湖南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等。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在加入共产党时，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武装起来。回忆我在1952年7月，也就是建党31年加入了党组织，当时除了学习《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章程外，又读了对我影响很大的三本书：一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二是陈伯达写的《论毛泽东思想》，阐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产生过程；三是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的修养》，要求党员无条件做党的驯服工具。经过不断学习与党的教育，逐渐形成立志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是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三是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四是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以此鞭策自己，永远跟党走。还要做到“三不”：不动摇、不变心、不走样，恒守自己的潜规则。

回顾在跟党走的72年岁月里，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感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今天新时代的中国。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它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背离或违反它，就会犯错误，惨遭失败。这可以从100年奋斗历史中得到验证。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以下十条：

第一，共产党从建党时 50 名党员，发展为拥有 9191 万党员，举世无双的执政大党。

第二，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从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到十四亿人口的人力资源大国，能够进行前赴后继伟大斗争的大党。

第三，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的 28 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人民站来的历史新纪元的大党。

第四，共产党从一穷二白、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极端落后的旧中国，经过 72 年艰苦奋斗，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灭了农村八亿人口的绝对贫困，成为奇迹，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大党。

第五，共产党从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欺凌的弱国变为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较大发言权与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党。

第六，共产党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军阀混乱的中国，变为 56 个民族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大党。

第七，共产党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身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不断修正自身缺陷，使党的基层组织始终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与模范作用的大党。

第八，共产党从民主革命创造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到建立新中国执政，建立起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各族人民能够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大党。

第九，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拥有现代化武装力量，反对一切干涉中国内政，不论来自何方外部势力的大党。

第十，共产党在应对重大危机，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也不论是来自外部或内部，都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挥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作用，战胜危机，特别是创造战胜新冠肺炎奇迹的大党。

总之，100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了一个又一个考验，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永垂不朽！我们既要对他们深表怀念与崇敬，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今天。

中国共产党 100 年奋斗历史中，也犯过一些重大错误，造成重大损失，而又能得到纠正。一是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至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第九、第十两次重大错误（有关“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问题），已得到改正。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特点。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失败是成功之母，胜不骄败不馁，谦受益、满招损，这些警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千古不朽。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在全国胜利进城以后，绝不能当李自成。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告诫全党，有了错误不怕，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

###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乘胜前进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员的灵魂，离开了它，就会犯不是左就是右的路线错误。整个国际主义运动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个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哲学，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在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不朽的。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不断遇到各种非议与挑战，也出现了失败的实践，陷入低潮。第一次实践是巴黎公社，法国工人阶级在 1871 年反对德国的侵略与卖国政府，于 3 月 18 日至 5 月 26 日建立了公社。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只存在 72 天，导致失败。第二次是震撼全球的执政 74 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垮台或消失，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质疑，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的极度混乱，这的确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的重大问题的争论，不仅在理论而且也在实践上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从中国 100 年历史看，无论是执政前的 28 年，还是执政后直到今天的 72 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一朵鲜花。根据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缺乏经验，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举行了多次城市武装工人起义均遭失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依靠农民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改变了在城市依靠工人举行起义和以弱势对强力攻打大城市的路线，使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从中国农村是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方，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而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的三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为挽救这一危亡形势，不得不举行史无前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起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奠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苏联为榜样，并在苏联援助与专家领导下，开展了工业化建设，照搬了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政策，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遇到极大困难，不得不调整依靠苏联的政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第三，在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消失后，中国也是受到巨大压力，西方国家以为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也会使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向西方靠拢。但事实与他们意愿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顶住了这种压力。

毋庸讳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消失，在世界发展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的确是一件令人深思的大事，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造成的，而有其内部深层次重要根源，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从近 30 年发展历史看，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解体”与“巨变”，使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是接受的，未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他们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基本原则的失败。在列宁逝世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输出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形左实右的官僚专制社会的发展模式，对外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沙文主义，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自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与卫星上天光环下，陷于不能自拔的困境。由此看来，变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方式与道路选择问题，说是“和平演变”也不为过。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苏联发展模式的否定和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改变，这也是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未能在中国产生连锁反应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会全盘否定列宁的十月革命和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以史为鉴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此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高度。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回顾 100 年历史，既有“左”的又有右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左”的错误则是主要的，危害性极大。那种认为“左”是革命的方法问题，右是反动的立场问题，“宁左勿右”是极其错误的，特别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号，压制不同意见，扣大帽子的恶劣作风，让它永远进入历史的垃圾之中，作为“肥料”。这就需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激发广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中国的强大献出自己的智慧与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领导下，使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举世瞩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具体部署。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历史上第四个大治时代，也不过分，我们有这个自信，尽管面临诸多新的严重挑战，关键是把党进一步建设好，正视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搬掉各种绊脚石，增强战斗力，乘胜前进。

**【注】：**苏联的发展模式，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均有详细记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有助了解研究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级经济师，2012 年 4 月 6 日）**

#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 ——在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召开的建党百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玉华

今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中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我先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三件大事：

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三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就是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三件大事

#### （一）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纪念日。

党的一大参会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13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

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中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10月1日这一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1、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2020年11月23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不平凡的日子，中央公布，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这一壮举，将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成果。

2、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突破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3年至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为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国还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3、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189元，消费较快增长，吃穿用有余，家电全面普及，汽车快速进入寻常百姓家。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险体系，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9.99亿人、2.17亿人、2.68亿人，基本医疗法保险13亿人。

4、科技创新作用凸显。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24426亿元，居世界第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60.2%。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若干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

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14亿人口，加上人均1万美元的中国14亿人口，总数为28亿人，数量翻了一番，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6、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另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伟大的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当代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 二、两次伟大的革命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个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代伟大革命，这是党的十四大对党的七十多年历史的概括。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这是就那代中央领导成熟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没有成熟。

## 三、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理论成果

“两次革命”的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纵览历史的大视角，似乎也为“两次飞跃”的提法奠定了逻辑前提。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为核心，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两次伟大革命”是从实践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从理论形成和发展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十三大报告中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 **四、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我们党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详见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且最后赢得革命胜利。

1978年12月,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伟大转折。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就开始了一场新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在新的革命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多次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大包干即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农村到城市,建立特区等。深圳40年建设,GDP等于一个香港。

#### **五、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简单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党的自身建设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题词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天天唱，坚决执行。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坏了要赔。有这样好的人民军队，能不胜利吗？中国有史以来，甚至世界上有这样好的军队吗？

## 六、改革开放的经验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了九条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有的专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也有三件法宝：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同意这个意见。

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胜利开启。在新征程上，我们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老干部，2021年4月16日）**

#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东亚农业

## ——在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言

温铁军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空间生态资源的社会载体是乡村聚落，需要与城乡融合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尤其在当前应对贸易战以及美国发起的去中国化、硬脱钩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下，中国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这也与中国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采用的政策体系创新有关。

从总的方向上看，在新冠疫情全球大规模爆发之前，2019年初，中央领导就已经明确提出要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以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那时候已经提出至少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这些变化说明，在越来越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政策上已经有准备，也有了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大思路。

当我们在这种战略背景下谈及两山理念、土地制度，谈及“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实现带动乡村复兴，就要理解，这些都是丰富了生产力诸要素内涵、并且势必要求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新领域。所涉及的不仅是生态资源作为新生产资料派生的权属关系形成对“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客观需求，还附着了农村“三生合一（生态生产生活合一）”派生的“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合一）”对农民的社会福利的承载，以及其对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治理成本的弱化。如同1980年代搞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之初，我们就已经提醒政策制定者注意土地的多功能性。到今天尤其不能忘记，生态资源当然不能只作为一个平面要素，而要看做承载着生态化战略转型的空间资源要素，在开发中要体现的原则是“空间正义”而不能增加空间资源开发的“基尼系数”。由于过去不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大量的山水田林湖草都可以纳入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所以，这些业态创新要对应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价值化实现的新的结构性要素。

总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改革也有新的要求，在生态文明战略下其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从一般农业生产力要素变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空间生态资源的载体。“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制度是承载空间资源要素的制度载体，生态化的土地本身又是对集体经济制度创新最根基的承载。所以，当我们讨论乡村振兴制度创新的时候，首先要从这个生态化视角来重新审视改革，讨论生态资源本身内在具有的多功能性，然后再调整乡村制度，以符合国内大循环这个新视角延伸出的新制度要求。

### 一、发展经验回顾：农业从“三生合一”到被作为“第一产业”

当前我们谈论三农问题要适应生态文明战略，就已不再是简单地讨论农业问题。

我过去常在讲座中问年轻朋友，农业自何时起被当作第一产业？农业是以何种逻辑被作为第一产业

来推进产业化的？

中国这种非殖民地化的农业从来都是“三生合一”。“三生合一”是生态、生活、生产，它是一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又需要这样的生产方式来维护。可见，万年农业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赖以持续的文明基础。

和西方的两河流域早期农业不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气候及生产条件都更适宜农业的一个狭窄区域。因为产出丰富，所以它的农业从来都跟积聚于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紧密结合。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从南到北纵跨五大气候带，而导致了浅表地理资源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东亚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因此，农业在中国，就是小农村社聚居于一定生态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为了贸易而由奴隶主推行的大规模生产，所以它从来都不是产业，而是与人们定居为社区的生产、生活、生存紧密相连，是人类依水依土而居的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文化。

直到中国被动应对殖民化打击，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立国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导思想的这个时候，农业开始被需要作为一种产业，以这种产业化发展所能够形成的剩余，来支撑这个不可能靠殖民化掠夺去形成剩余的民族工商业，以最终让工业成为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当历届政府都把西式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而不得不把工业的原始积累建基于把农业作为产业的这样一个制度安排的时候，农业才渐次改变为一种产业。

乃至中国近代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因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改变了传统三农并生、三生合体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派生了农户破产、乡村衰败、流民四起、豪强割据，才演化出来的。

## 二、历史演变：农业是数千年之国本

中国的农业本来是一种意志性非常强的人类文化生存方式，但因为气候变化，水来了，必须疏导，于是就有了以水立国的大禹，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从一个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成为了一个政治国家。

黄河从青藏高原出来，水流顺势而下，在积石山一带形成了几个拐弯，那一带据说是大禹治水最早的水利工程所在地。然后黄河向上进入西北，拐个大弯下来，在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又有一个治水的关键地带，这一带后来就成为农业物产相对丰富，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于是建立了夏。在黄河离开晋陕大峡谷开始向河南拐弯南下的地方，考古发现了当年大禹建立的宫殿议事堂的遗迹。因以治水需要动员劳动力，领导者必须有德的高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它是一个德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因贸易而必须形成契约关系的所谓法治社会。

这个德治社会延续到后来，形成了周朝。改变了从夏代以来的分封制，也就是夏往后几百上千年间这么一种多部落联合的联盟形式。到了周代，家国天下形成，以自己本家族来形成对于新占领地区的分封。随着家族被分到了某个地方，以地名为国名，于是变成周代分封天下的政治格局。而这个政治格局又以裂土分封为基础。于是，家国天下就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早期土地制度的原型。

周代延续 800 年，到晚期的时候气候再度发生变化，北方民族大举南下，遂有战国七雄，那是因为要对付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南下，所以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史称“北方六国”。如果按照周朝的制度一

个诸侯只有家丁没有军队，当然是不可能对付游牧部族全面南下的，于是诸侯就开始立国，就要有军才能对付南下的游牧部落。同期一个历史现象，就是六国都沿着 400 毫米等降水线形成了古代的长城。这六国长城都是沿着农业带的北缘形成的，以抵御游牧部落南下圈地放牧而对农业民族的大肆屠戮。

到秦完成统一、建立了郡县制；然后汉承秦制延续几千年的中央政府到县级的政治体系。因为不再裂土分封，中央的政府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以赋税来维持中央王权，并且一定程度地维持军队的这样一个体系。

那个年代以后，气候冷热交替不断，变热的时候农耕民族往北推，变冷的时候游牧部族就南下。南下一次几乎就会导致平原地带“万户萧疏鬼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民族必须形成并且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使得地域纵深广大，才能够相对成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来养军护国，保住农耕民族在华北、江淮、两湖等平原地区这种分散定居的村落形态不被游牧民族大规模摧毁。每当游牧民族南下造成战乱，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家族就得南迁，遂有闽越客家的“陈林半天下”。

总之，农耕作为青藏高原崛起的“亚洲水塔”效应派生的一种人类生存相对进步的定居文化的方式，并且会随着气候变化造成的族群冲突而从北方中部的平原地带不断南移到南方山区，最终形成了以传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且涵盖面涉及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甚至中南亚等地的地域文化。

至于青藏高原地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隔开了掠夺成性的雅利安人占据的南亚和西亚，又一度被吐蕃控制，所以中华农耕文明并没能覆盖到印度次大陆，而是停步在缅甸野人山这一带。现在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学者们都认同，和欧洲文化有一定历史相关性的南亚文化，是当年气候冷化的时候，从波罗的海一带南下的雅利安人由于很早掌握了轮毂技术而得以整个族群大迁移。据说分了三支，一支进了希腊，一支进了波斯，一支进了印度。于是这三支北方顺畅南下所形成的掠夺文化，就带来了奴隶制、种姓制，这一系列的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不那么和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借助殖民化的历史传承，就延续到当代。

所以华夏农业，延续了几千年并非产业的那种农业，它是国本，是它维持了生存以及文化繁衍。如果我们仅仅把土地狭义的抽象为农业生产要素，那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史的割裂。

### 三、近代演变：资本对乡村制度的影响

当我们谈及乡村制度，需要把国家体系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做研究，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研究。

首先要说，近代乡村基本制度源于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基。因为，清末以来都要按西方模式搞工业化，又没有条件像帝国主义那样靠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积累，只能把乡土中国的农业变成所谓产业，方便从中提取剩余来支援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乡村的地主先演变为在外地主，再转型为工商业地主，然后转型为工商业资本家。

至于乡村制度在今天的演变，是主要出于三农的需要吗？并不是，今天的乡村制度仍然主要是服务于城市资本扩张的需要。新世纪房地产资本、债务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对政策、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资本力量，导致今天乡村制度出现严重不利于农民，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演化，这是三大差别问题的根。何为经济理性？现在只要不符合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的利益要求，就是不合理性。

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合村并居的问题。合村并居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地票，地票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占补平衡，甚至允许在跨区的大范围内占补平衡。

过去，为了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允许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增长中心，比如把县级城关镇变成产业中心。但为了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生产粮食，国家不允许随便占用耕地，不过，却允许拿当地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用地来换。比如贫困地区的农民建房，农民办厂，农民办作坊，只要把这些农村的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那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拿到县城来用，也就是允许贫困县内部做一点土地开发在空间上的调整，这叫做占补平衡。

后来重庆搞地票制度。因为重庆过去是“三大”——大山区、大库区、大贫困，城区建设用地非常局限，没有产业发展条件，就搞了地票交易试验，把贫困地区农民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到城市的主城区，使得城市主城区建设面积从 580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0 平方公里，变成第四个大城区，也由此称为西部明珠。

这种地票交易扩展到成都、江苏、山东、浙江，实际是发达地区把欠发达地区的做法照搬过去，就变成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配合地产商们再捞一桶金的制度优惠。

比如苏南土地极为紧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就差不多能卖 100 万。但在苏北，大概只能卖二十到三十万，这其中有七八十万的差价。允许土地异地来实现占补平衡，是苏南这三大资本结合的政策要求；但是，这也使得苏北农民在本村扩张宅基地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农民们也不能自主的发展地方经济、村庄经济。总之，农民动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都被法律约束，更别说改善生活盖个二层楼，哪怕过去是苏北泄洪区，当年洪水一来要泛滥成灾的地区的农民也只能搞一层住房，凭什么？就凭资本要利。

中国只有 12% 的平原面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 9.6%。这么一来，几乎这百分之九点几最适合产农业的土地都盖了楼，就把耕地赶上山了。所以现在最不宜产粮食的很多耕地都被保护在山上。粮食种植成本不断上升，本来没有任何竞争的余地。现在又把农民集中居住，他上趟山很难。所以粮食安全一部分其实是虚的。

#### **四、政策反思：乡村制度安排需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大家谈土地制度，谈合村并居，一般都简单地从农业上讲，让农民住进七八层高楼，生产工具放哪？小型农机具拖拉机往哪放？只让农民按建筑面积折算出进城住楼的面积，还得让他花钱买房。就没想进了楼以后，所有小农经济的农牧结合，多元化的庭院经济全都被毁。养鸡的变成吃鸡的，卖蛋的变成吃蛋的，养猪变成吃猪的。依靠这样的保障体系能保障得了 14 亿人吗？世界上没见过这种自毁安全体系。

有些官员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直接影响国家安全。这种凭教科书想象出的一个浪漫主义政策体系，自以为在做某些符合理论逻辑的改制，其实是在破坏掉国家的生存基础。所以每每谈论乡村制度，常会引起我强烈的愤懑。这些年照搬教科书，可以叫做“换神运动”，为了打鬼而请来钟馗，为了打尖船利炮请进来矛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后把德先生那套程序主义变成了今天大家都必须遵循的颠扑不破的村级直选制度体系。殊不知，这一通“打”，毁掉的还有自己的生命根源和文化遗产。西方神是绝对排斥性的，就因为换了神，整个政策制度体系都是这套新神的体系。今天乡村的年轻人大量地去信西方的

宗教，本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包容性却被扔掉。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中华文明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怎么能形成乡村聚落？及时同一个姓氏的家族内部化机制，也因时间长了早已出了五服，各方能力强弱差异性明显，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如何能够邻里相望，守望互助？当他们受到大规模侵袭，如何能够家族整体南迁？到现在福建广东仍然陈林半天下，大姓往上都能找到在中原地带的根。

所以乡村制度要有文化基础，要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今年土地管理法修改，我们最低要求是同权同利，说到底那只是一个浅层次的要求，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回归到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 五、战略方向：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近年来的制度条件下，土地虽然作为承载山水田林湖草的一个紧密的结构体系却早就被拆开切碎，如果第三方公司按照农业产业的产出简单做出一个所谓的土地价格评估，然后再用一个粗暴的市场制度把它卖掉，那就是一套非常糟糕的政策安排。

我们今天主张具有空间正义的生态资源不可简单粗暴地进入市场。作为非标资源，它具有公共性，要体现生态空间资源开发中的空间正义或者叫生态正义。中央讲乡村振兴，要推进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恰恰是一个相对不容易被市场化、不容易交易的生态资源的空间正义的体现。

生态正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都有所体现。土地产出我们有义仓；要修河我们有河田；要建立宗庙宗祠延续宗族文化，我们有族田有庙产；要传承教育，我们还有学田。越是靠近南方山区，私田占比越少，在广东有些洪水容易泛滥的地方，公田占比重高达80%以上，过去当地人叫祖宗田、太公田，在今天被叫做村社集体经济。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我们历史文化延续的一个客观结果。

所以，我们试图把资本市场里一级市场形成股票初始定价这一内部化定价过程搬入到“三变”改革中，用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使得非标的空间生态资源体现空间正义，内部来完成这些资源的股权化。

进一步，由集体形成的资源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代表一方百姓的利益，以包括土地在内的空间资源、生态资源对外发行绿色债券。然后用债券发行在县一级建立平台去对接外部金融投资，以使得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不再依靠美元流入来发行，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生态资源的货币化过程。于是货币有途径回流到乡土社会，以解决乡村资源丰富，但是资本稀缺的矛盾。

如此这般，我们就把（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生态资源和（国家主权应该控制的）货币纳入到一个形成闭环的经济过程之中，就能实现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弱化我们被迫硬脱钩，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体系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受到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原来被动地锚定在美元上，后来锁定一篮子货币，而现在，人民币可以锚定于本国的生态资源货币化、资本化的过程中。这样，只有中国的乡村制度立足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转型需求，而不再以教科书想象出来那个简单的生产资料为根据，我们才能更好地思考中国的乡村生态化发展应该做出怎样的制度安排。

**（作者系教授、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 天价“洋种子”背后的种业之痛

王 建

近年来，国产种子研发能力逐步增强，市场占有率也稳步提升，但仍有部分农作物依赖“洋种子”，在一些品种、环节和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和弱项。比如资源保护利用不够，一些领域育种创新特别是基础原始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玉米、个别蔬菜品种等竞争力不强。专家表示，“洋种子”受制于人，必须尽早通过突破关键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和深化市场改革，提升育种技术和实力。

## 一、种子创新能力增强仍有部分依赖“洋种子”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秦家村农民崔明种了 30 多年地，2020 年他种了 100 多亩水稻，品种是“绥粳 18”，每亩产量达到 1200 斤。而在 10 多年前，他所在地区，缺少水稻主栽品种，仅有的一些水稻品种品质优，但易倒伏，产量低。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黑龙江省农科院水稻品质育种研究所所长聂守军带领团队在黑土地上攻坚，播种、管理、观察、记录、选择、收割，再对收获的水稻进行对比试验，筛选出理想的品种材料……经过多年努力，聂守军带领团队选育出了一系列优质、多抗、香型水稻新品种。其中“绥粳 18”成了黑龙江省第二、三积温带主栽品种。近年来，该品种在黑龙江省年推广面积达 1000 万亩以上。

去年秋收之际，在黑龙江省和平牧场科技示范园区，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选育而成的大豆新品种“合农 71”进行田间实收测产，实收面积 5.2 亩，平均亩产量 336.2 公斤，刷新了东北地区大豆实收单产纪录。

东北地区是我国大豆主产区，一直以来，大豆单产低是制约我国大豆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黑龙江省种业技术服务中心研究员黄春峰说，这次测产打破了东北地区大豆单产纪录，说明东北大豆产量还有提升空间，应加快优势品种转化，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引领作用。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100%自给，大豆种子立足国内有保障。专家表示，我国水稻、小麦的育种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已形成比较健全的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

与水稻、小麦不同，我国部分玉米品种要靠“洋种子”。专家表示，我国玉米种质资源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培育品种源头的种质资源或育种技术方面，国外可以卡住我们的脖子。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种子“先玉 335”推广至今已十余年，是我国部分地区的重要玉米品种，推广面积比较大。黑龙江一企业从德国引进早熟玉米品种，具有早熟、脱水快、抗倒伏等特点，在黑龙江北部得到大面积推广。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蔬菜“洋种子”依赖症已大大改善,但仍有部分高端蔬菜依赖“洋种子”。“国产蔬菜种子按斤论袋卖,‘洋种子’按粒卖”曾是我国蔬菜产业面临的尴尬。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三年前,中国化工集团完成了对瑞士先正达公司的收购,收购金额达到 430 亿美元。同时我国也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在全国“菜篮子”寿光市,国产蔬菜品种市场占有率从 10 年前的 40%提高到如今的 80%以上。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十三五”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青花菜岗位专家李占省介绍,2018 年,浙江牵头组建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整合国内外育种资源和技术优势,以加快品种创新步伐,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品种。目前我国自主育成西兰花品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由 2017 年的不足 5%,现已提升 15%至 20%。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数据,2019 年我国蔬菜种子进口 2.24 亿美元,占种子进口额的一半以上。在一些地区、一些品种,尤其是蔬菜“洋种子”占比超过 80%,甚至几乎完全依靠进口。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研究员张慧举例,比如西兰花、洋葱、萝卜、菠菜等,“洋种子”占比仍较高。有专家介绍,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 95%以上。

李占省表示,尽管我国蔬菜品种自主率大幅提升,但仍有一些品种的进口依赖度很高,如高端设施农业中的一些蔬菜,长季节栽培的番茄等,还是国外品种占据主导。在引进品种中,涉及设施农业的栽培品种,是进口依赖度最高的,一些品种的进口比例甚至超过 90%,如青花菜对外依赖度达到 95%,杂交胡萝卜、菠菜、洋葱等进口依赖度 90%以上。数据显示,蔬菜种子进口额度最大的前 5 位,分别是番茄、青花菜、胡萝卜、菠菜和洋葱。

## 二、“洋种子”价格受制于人

目前,世界前 20 强种业集团形成“两超、四强、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据华安证券的报告显示,拜耳、科迪华(杜邦陶氏的农业部门)两者销售额占据世界前 20 强的 60%,并且拥有大部分核心专利技术。先正达、巴斯夫、利马格兰和科沃施四家企业的销售总额占世界前 20 强的 26%,剩余 14 家企业,市场份额较小,仅占 14%,但这些企业都拥有特色的种子业务。

与国外蔬菜种子企业相比,我国种子企业育种研发仍较薄弱,国内种子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的现状,又进一步限制企业科技投入能力,形成恶性循环。我国蔬菜种业卡脖子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张慧说,在黑龙江种的胡萝卜和长日照的洋葱、菠菜、番茄等基本上都是进口种子,国内在这方面的种子研发比较薄弱。专家表示,国外种子研发多是在大公司,种质资源的收集都是百年的积累,起步早,科研投入大。而我国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不完善,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主要依赖科研院所,投入有限,基础薄弱。国内很多蔬菜种子的收集比较杂乱,最原始的种质材料积累不纯正。

李占省介绍,当前的难点:

首先是优异种质资源缺乏,我国在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方面起步较晚,相应的储备和鉴定工作相对滞后。

其次,尽管我国主导开展了大部分蔬菜作物的基因组测序工作,但在一些重要农艺性状基因上,比如抗病、雄性不育等基因的挖掘、功能机制研究等,较为滞后。

其三，关键育种技术创新不足，我国已经开展了单倍体育种、自交不亲和、雄性不育、雌性系等相关研究与应用，但是与国外普遍存在差距，形成了一定的技术瓶颈。

第四，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应用不够，基因编辑是农业领域的 5G 技术，我国在大田作物育种中，已经广泛使用，但在蔬菜上，还只是在少数作物中开展研究，大部分作物没有开展及应用。

专家表示，部分品种依赖“洋种子”，其市场价格和利润受制于人，会影响我国的价格主动权和市场话语权，可能给种植大户带来经济损失，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

黑龙江一蔬菜种植合作社去年种了 1 万多亩辣椒，其中 1700 亩尖椒和近 1000 亩圆椒使用的是以色列种子。“国外种子确实好，以尖椒为例，国内尖椒种子只能采两茬，国外种子可以采三茬，而且外形好看、市场认可度高，销售好价格高。”该合作社负责人说，就是进口种子价格太贵了，一亩地仅种子成本就 1500 多元。“算下来，一粒进口种子就 2 毛钱，以前播撒种子时，国产种子伴着沙土撒，进口种子就一粒一粒摆，生怕浪费了。”

近年来，西兰花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然而，我国西兰花种子供给却长期被日本、欧洲等地的种业公司垄断，广大西兰花种植户曾陷入“种贵”“无种”的尴尬境地。一种植户表示，像国外的一个品种，芝麻粒大小的种子一包 10 克，卖 150 元，还经常买不到。从日本进口的 10 万粒包装的西兰花“耐寒优秀”，每袋从 3500 元曾涨到 2 万元左右。

李占省说，前端成本的上涨还只是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西兰花具有“种植体量小”和“产业价值高”的特点，栽培面积只有 150 万亩左右，但相当于其他一般蔬菜 1000 多万亩的产值，一旦主栽品种种子供应不及时，就会耽误播期，直接影响我国销售市场的下游供应和出口贸易。

据李占省介绍，西兰花种植户相对集中，我国每年西兰花出口 14 万吨，在近千种蔬菜中出口占比较高，成为农民增收、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我国有 20 多万亩耐热西兰花品种，国内没有耐热替代品种，一旦出现供应问题，农民将遭受损失。”李占省说。

与西兰花情况类似，同样严重依赖进口种子的甜菜产业，也存在类似问题。作为重要的糖料作物，我国的甜菜育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我国甜菜产业中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基本上靠进口。糖类专家表示，在我国食糖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世界糖料供应整体处于紧平衡的背景下，一旦外国甜菜种子企业不能按时足量保质地供应种子，我国食糖产业的长期稳定供应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 三、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畜牧种源方面，受国外品种影响，我国部分优质畜牧品种消失。黑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刘娣从 1999 年开始研究民猪，据她介绍，民猪曾是东北地区的当家品种，但随着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的国外商业化猪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快速地涌入我国，使得国内的地方猪种受到极大的冲击，包括民猪在内的所有地方猪种养殖量都急剧下降，种质资源岌岌可危，2016 年原农业部公布了我国地方猪中有 37 个品种灭绝、濒临灭绝和濒危。

种子是农业的基石，现代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被称为农业“芯片”。种业的竞争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农业产业的竞争能力，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高科技战争。近年来，我国现代种业体系加快构建，种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以生物育种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种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国外大型种业企业跨界重组日益加剧，强强联手抢占全球市场，我国民族种业仍面临严峻挑战。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六省份 375 个县，71.8%的粮食作物地方品种消失，其中不乏优质、抗病、耐瘠薄的特性品种，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尚未形成种质资源利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有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打赢种业翻身仗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我国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 52 万份，但目前完成资源精准鉴定的不到 10%，在挖掘真正有用的基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进一步落实。科研人员缺少产业化推广的精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而散，科研水平不高。李占省说，日本坂田公司每年都会拿出收入的 10%投入科研，也就是一年好几个亿。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前 50 强种业企业年研发投入为 15 亿元人民币，仅接近原美国跨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的 1/7。

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到位，科研人员就有后顾之忧，不愿与企业合作；而企业也不愿投入，担心遭遇侵权假冒。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富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生产销售大豆种子为主，年销售大豆种子 3 万吨左右，公司总经理李文国说，部分地区一些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或农业合作社，其持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既包括农作物种子，也包括商品粮食。有的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商品粮，然后作为种子，以低于正规种子价格销售，扰乱市场秩序。还有的种业企业把已推广的良种稍微改变一下性状，就当作新品种推广，造成市场上种子同质化育种现象严重。

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农村部已确定，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保持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国家支持种业的政策已经明确，需要科研人员更多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企业家更多雄心壮志，共同打赢种业翻身仗。

相关专家建议，“十四五”时期加大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力度。对濒临灭绝的优质地方品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学习先进种业的做法，注重挖掘有特异性的性状、基因，以丰富优异的种质资源和强大的基因库，为种业向质量型跨越创造技术和物质基础。生物工程技术是育种产业的一把利剑，专家期待相关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能够加快启动实施，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政策，打破科研院所和企业界限，以产学研用相融合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化，建立完善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商业化育种科技创新组织体系。

**（作者供职于经济参考报。本文原题为《部分高端蔬菜仍依赖洋种子，专家：须尽早提升育种技术和实力》摘自经济参考报）**

## 一个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韩东屏

“三农问题”简单说，就是指农民穷、农村苦和农业落后。这个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都为之想了也试过很多解决办法，可迄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俨然已成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希望的“老大难”问题。

其实不然。只要采取一个基本举措，再配上另几个制度规定，就能使之得到快速而彻底的解决。

这个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允许人们自由迁徙的制度改革。

由于农村苦，农民穷，有此举措之后，大量农民就会不断地向生活条件优于农村，人均工作收入高于农民人均收入的城镇转移，接着在这些农民名下的土地，就会逐渐转移到剩下的依然乐意务农，并且肯定也更擅长务农的农民手中，不然这些人也会进城。为了防止已迁至城镇的农民不转让土地，任其撂荒，可在农村土地制度上规定，撂荒一年或两年的土地一律收归集体重新分配，这就可以保证所有的土地不被撂荒，而是会以较低的租赁费转租给其他务农者。之所以会是“较低租赁费”，在于剩下来的能接受转租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于是，农村的大量土地就逐渐集中到了少数农民那里，而这些农民就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乃至越来越大的规模经营，并有强烈欲望也有日益增多的资金实力增加对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投入与运用，从而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形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效率。这样，这些还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就富裕起来了，甚至较多地超过城市人均生活水平。既然农民富裕了，自然就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农村生活不再困苦，而且还有比城镇更惬意的自然生态环境。这时，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问题也随之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应该在五年左右即可完成。

或有人道：取消户籍制后，很可能有的村子全村农民都走光了，撂荒的土地又靠谁来接手经营？

这不必担心。首先可以有附近村子或其他地方的农民来接手经营，此外还会有城里人来接手经营。近日看到一个《村子已死》的帖子，慨叹现在的农村，“农民已渐渐逝去”“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当起了农民”。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好？这些愿意来当农民的城中土豪，既有兴趣，又有资金，还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更多了解，由他们顶替已移居城里的农民，显然只会有比以往更好的务农效果。另外，这样的城里人来农村，还可使农村的人均文化水平和农村的文明水平也被大幅提高。

或还有人道：敞开大门让大量农民涌入城中，岂不是会造成混乱和失序，让城市管理压力倍增，不堪重负？那些能在城里站得住脚，找到稳定工作的农民是可以脱贫，变为城里人，达到城里人的生活水准，但那些没有找到工作，居无定所的进城农民则依然贫穷，不仅生活难以为继，还往往会生发出“贫寒起盗心”的不法行为，从而劣化城镇社会治安。而这，也正是一直以来，社会管理者总是不愿取消户

籍制的顾虑之所在。

这个问题也不足为虑。首先，大量农民进城后，工作人口会增加，为新增的进城人口提供各种服务的商业和企业也会相应增加，于是城镇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同样相应增加，这就不会有管理成本不堪重负的问题。其次，在人人有身份证，并且还有发达网络和大数据的时代，一个城市涌入的人口再多，也不会比没有身份证、网络和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管理更难。最后是再配套一个统一的均等化社保政策即可。这个政策的要义是，社会保障实行不分城乡的全民覆盖，并且全国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养老标准和医保标准等一般性社会保障都一律化。据此，只要是在某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的人，都由此地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并享受和当地市民一样的市民待遇。这样，那些进城一时还未找到工作的人，就可以安心地继续找工作或者再到其他城镇找工作，就没有必要为了生计而违法乱纪。而他们一旦在某个城镇找到稳定工作，也就成了那里的城镇居民，就有了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于是，进城的农民最终基本上全都会变为城里人，都会脱贫。

并且，由于这时各地的社保水平和标准都是一样的，而越大越发达的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会越高，因而那些先选择涌入大城市却未能立住脚的农民，就会愿意再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城镇去找工作和发展。在这些地方，同样数量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大量人口就会向中西部地区或偏远地区的城镇转移，这就也会促进这些地方的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逐渐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基本平衡。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而未获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有鉴于此，社会管理者也就不必有另一个担忧，即放开户籍，会使大城市人满为患的问题。

实施上述几个制度安排之后，不仅可有以上已经提到的各种好处，还至少会收获另三个重大好处。一是在如此快速、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这个过程中，政府竟然不用花一分钱，也无需费心思搞任何形式的“工程”或农村脱贫工作，而只是制定几个制度就万事大吉，真正做到“无为而治”，一本万利；二是我国欲望已久的城市化也将在这个进程中迅速完成；三是由于成为城里人的农民这时已可以将家人一起带到城里生活，享受当地人的同等待遇，于是就没有了困扰我们已久的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不会再有每年一度，令个人和政府都闹心、耗时和费财、费力的“春运难题”。

倘若以上所言不虚，那么，取消户籍制和配套相关制度安排，就的确是可以快速而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并且还会有许多令人惊喜的意外收获。既然如此，若真想解决“三农问题”，社会管理者就应尽快实施这个一举多得的方法。否则，就意味着对时间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后改革开放的越南，由于已于今年取消户籍制，也一定反而会先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

其实，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所有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和城市化进程，岂不都是这样解决和完成的？这就说明，这个方法，也是已被实践经验证明为有效的方法。个中道理，用市场经济理论说，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的最佳资源配置功能，使农田、山林、牧场、种子、牲畜、农机等农业资源能够流转到最会发挥它们效用的生产者那里，让劳动者能够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就足以证明，市场的“魔力”是非常巨大的，关键在于我们会不会用。

**（作者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原创于2020年9月7日）**

## 再生农业：恢复土壤，助力碳中和

丛源勃

假如一位对地球有不良企图的外星人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地球人未来吃不上饭，他会发现：不需要做什么，因为地球人目前普遍奉行的“化学农业”正在帮他实现这个目标。

“化学农业”还有其他名字，比如“工业化种植”、“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等，每个名字背后都反映出这种农业形态的部分特征：

“化学农业”强调其对化学品（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重度依赖；“工业化种植”将其与传统小农以人畜为主要劳力的精耕细作相区分。“工业化”追求效率优先、流水线生产，通常要求大面积的整块土地，以利于重型农机的运作，用机械完成从翻耕、播种、喷洒药剂到收割的一系列过程；“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也是同理，在几十亩、上百亩的土地上种植有限的几种作物，便于农机的统一作业。

相比于在世界各地传承千年的古老农耕，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化学农业”还是个很年轻的孩子，但它的破坏力却不容小觑：目前，全球耕地已有近三分之一处于退化状态，这多半是它的功劳。

### 化学农业的前世今生

20 世纪初，伴随着人工合成肥料和化学农药制造技术的出现，现代化学农业崭露头角。二战末期，由于炸药和化肥有着相似的原料需求，很多制造生化武器的军工厂开始转型生产化肥，为化学农业奠定了工业基础。

而 20 世纪 60 年代，起源于北美，后在全世界推广的“绿色革命”则为化学农业的普及进一步推波助澜。当时，美国一位研发农药的年轻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受美国政府委派，赴墨西哥帮助当地农民提高粮食产量。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反复试验，布劳格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新型矮秆小麦，结合化肥的施用，产量比原品种高出三倍之多。

随后他将这一技术带到印度，将印度从当时的大饥荒状态拯救出来，甚至一度成为小麦的净出口国。在那个经常要忍饥挨饿的时代，粮食增产的诱惑势不可挡，“绿色革命”很快也应用到其他主要粮食作物上（比如玉米、水稻），并迅速在亚洲各国流行，取代了原有的老品种以及传统施肥方式。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化学农业成为世界各国农耕实践的主流，而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科研单位的研究导向，农资企业的研发投入，也在支持着化学农业的兴旺。

### “高产”奇迹的背后

然而，粮食增产的奇迹背后并非没有隐忧。

“绿色革命”需要一系列条件相配合：无法留种自播的杂交种子、大型水利灌溉系统、足量的化肥农药，属于资源密集型与高耗能农业。杂交品种由于根系浅短，无法深入地下汲取水分，大部分依靠人工供水，是原始品种需水量的数倍——对于很多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如此庞大的需水量足以造成当地的水资源危机。另外，由于育种专利掌握在种子公司手中，农民每年需要重新购买种子，额外增加了生产成本，当年很多印度农民不得不举债买种，甚至因债务过重选择自杀者亦不在少数。

更危险的是，基因库单一的杂交种子在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将全军覆没，根本没有机会筛选出能够抵御特定灾害的优良品种。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日益频繁的今天，只追求某一特殊性状，而难以应对风险的杂交育种农业还能走多远呢？

“绿色革命”的副作用还不止这些。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投入摧毁了土壤中的微生物网络，缺少了生命活动的土壤逐渐板结、硬化，透气透水能力越来越差，如此便需要更重的机械来翻地松土，并且需要更频繁地引水灌溉。

如此经年累月，奄奄一息、“全身”硬化的土壤不再能“喝下”那么多水，也“吞不下”那么多肥，大部分化肥和土壤有机质都被流水冲刷进江河湖海，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为环境平添负担。在化学农业中，浪费掉的可能不比实际发挥作用的资源少。

短时间内促成“高产”奇迹的化肥，在数年之后，就无法再对产量起到任何提升作用，而土壤的自然肥力早已消耗殆尽，由“沃土”变为“尘沙”，化学农业带来的是一块又一块失去生机的“死亡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曾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的“绿色革命”，正在衍变为问题本身，世界农业必须寻找新范式，以适应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的未来。

### **另一种选择：再生农业**

“再生农业”（Regenerative Agriculture）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提法，相较而言，大家更为熟悉的是“有机农业”。当城市消费者知道，由于化学品残留，化学农业下的农产品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时，会开始选择有机蔬果或亲耕亲种。

不过同为有机，也有层次之别。最低程度的有机农业，只是将化肥替换为外购的有机肥，将化学农药替换为生物农药，操作方式上仍重度依赖农机和大规模单一化种植。这样的有机农业并没有培肥土壤，促进植物生长的肥料始终来自外源，没有足够的有机质（比如植物残枝、动物粪便）供土壤微生物分解，以形成富含腐殖质的土壤团粒结构。团粒结构是土壤蓄水透气保肥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土壤中，植物才愿意深深扎根、立足自己，对自然灾害也会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针对以“工业化”思维做有机农业的缺憾，“再生农业”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方案。虽然这是个新概念，但“再生农业”的实践原则并不新鲜。在20世纪的有机农业浪潮中，朴门永续农业、日本自然农法、生物动力农法等流派都为“再生农业”提供了灵感源泉，取名“再生”，是效仿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循环永续的特点，将之应用到人类的农耕活动中。

在“再生农业”中，对土地的耕作需要最小化，以免破坏土壤里的生命王国。为了给地下生命王国提供充足的食物，“再生农业”除了种植经济作物，还会做些“无用”的事——种植没有经济价值的覆盖作物。覆盖作物有多种用途：可以填补地表裸露的空缺，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农场物种多样性，为授粉者、益虫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自然食物链中的相互制衡防治单一虫害的泛滥；覆盖作物死亡后，也可以成为地下微生物的食物来源。

此外，“再生农业”格外重视农场动物的价值，有别于工业化思路下的“种养分离”，“再生农业”重新将动物带回农场，通过合理的规划，放牧活动所产生的粪肥是加速土壤肥力恢复最得力的助手。

根据五项基础原则，再结合当地情况和农夫的创造性应用，“再生农业”可以有无数种变体，而所有变化都不离一个核心：恢复土壤的生机。

纪录片《亲吻地面》中曾介绍，土壤可能蕴含着扭转气候变化的巨大力量。美国有机农业的先驱性研究机构——罗代尔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在最近出版的白皮书中评估道：如果全球普遍采用“再生农业”的实践原则，地球的土壤将完全有能力吸收掉人类释放的所有碳排放。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研究，罗代尔研究所也证明了“再生农业”的产量并不输给化学农业，完全有能力担负起喂养地球人口的重任，并且比起化学农业，“再生农业”在极端天气面前也更有复原力与抗风险能力。

假设这一评估准确，那么就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最有效的方案就存在于土壤之中。只要改变农耕方式，植物与土壤微生物的密切配合就可以实现“减碳”工程，根本不需要科技大佬花重金研究“碳封存”技术。

然而，转向“再生农业”意味着放弃围绕化学农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产业链，这势必会影响到无数从业者的生计，所以大规模的集体转向，可能只有等到“化学农业”在气候变化面前真的无计可施时才会发生。

截至2014年，我国40%的农业用地面临着严重退化与地力衰退，但国家层面已经有了土壤修复意识，比如在东北黑土地的部分区域实施保护性耕作方式，采用免耕播种机播种、秸秆还田等措施增加黑土地的有机质含量。中国提前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土地净恢复面积的全球占比为18.24%，位居世界第一。

土地退化得到遏制之后，利用什么样的农耕方式来“收复失地”，重新给予受损土地生机活力，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而再生农业为我们开出了一道“处方笺”，等待着为土壤寻找出路的人发现它。

今年的世界地球日，让我们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壤吧。作为消费者，可以支持再生农业的实践者；作为新农人，可以为市场提供生态友善的农产品，为有意识的消费者提供多一种选择。

**(作者系中国绿发会良食基金编辑。来源：澎湃新闻一舌尖上的中国栏目)**

# 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工程

王正谱

疫情冲击下，全球贫困率在 2020 年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上升。中国在 2020 年如期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人类与贫困斗争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有哪些是中国独特的优势，又有哪些是广泛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的？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 4 月 19 日举行的“面向 2030 年的减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上，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正谱就此进行了分享。

## 一、中国减贫的“有效做法”体现制度优势

王正谱首先表示，他愿意用“有效的做法”来代替“经验”一词。每个国家总结出的经验都有一定地域性，与国情的特点相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他认为，中国在减贫过程中体现自身特点的“有效的做法”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近一百年来，都以这一点作为全党同志的奋斗目标。

第二，中国把脱贫攻坚放在了治国理政中最突出的位置之一，在每年的长期规划、短期计划当中，都把减贫作为一项重大的工作进行安排。

第三，中国集中全部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集中攻关，在短期内特别是近八年来，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同舟共济，一起来攻克这个堡垒。

“这三个有效的做法也是中国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政治优势的体现。”王正谱说。

## 二、要用发展的方法来解决贫困

中国在减贫过程中发挥了自身优势，那么，中国减贫的有效方法有哪些是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呢？王

正谱同样作出了三点总结：

第一，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贫困问题。造成贫困的原因常常是基础设施和环境问题，所以中国在防止返贫、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目的是让贫困地区更好地与外界沟通。

第二是“精准”，这两个字很关键。谁贫困，我们把他挑出来，找到他贫困的原因，针对个体原因施策。

第三，是调动贫困者的积极性。因为贫困是贫困者的贫困，外界再使劲也只是帮助，一定调动他们的内生动力。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特别注意扶志，要让贫困者有志气，从自身努力。中国扶贫在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王正谱表示，在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既有道义上的支持，也有经济上的帮助，还有世行、粮农组织等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中国脱贫攻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对此心存感激。在脱贫攻坚胜利之后，中国也愿意把自己的做法介绍给其他国家，帮助其他国家推进减贫事业。

### **三、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工程**

在脱贫攻坚胜利后，中国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王正谱做了一个比喻，“脱贫攻坚应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堡垒，是一个标志性、关键性的工程，而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工程，到了2035年乃至2050年，中国宣布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刻，乡村一定要振兴，否则我们很难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乡村振兴的意义就在于此。”

王正谱表示，乡村振兴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特别是一些有情怀的人士，包括企业。他同时强调，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特别愿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也特别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本文图片略。转自：《北京日报》2021年4月19日）**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

郑风田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虽说同为三农工作，但脱贫攻坚是解决温饱问题，而乡村振兴是解决富有问题，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是解决全国所有农民如何富有问题，包括未来的农业如何高质高效，未来的乡村如何宜居宜业，未来的农民如何富裕富足。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一是对已经脱贫的 832 个贫困县、12.8 万个贫困村和近亿脱贫人口如何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做到不返贫；二是全国其他的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脱贫人口如何在乡村振兴中衔接学习脱贫攻坚战中形成的体制机制，加快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整体布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020 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当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021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更具体的文件，也是国家“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的平稳转型，把脱贫人口统筹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使脱贫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脱贫地区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政策

从《意见》内容来看，未来我国要通过六大方面共 24 项措施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聚力做好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着力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全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

早在 2020 年 3 月 6 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为了巩固和保持脱贫攻坚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4 个不摘”：“摘帽不摘责任”，防止松劲懈怠；“摘帽不摘政策”，防止急刹车；“摘帽不摘帮扶”，防止一撤了之；“摘帽不摘监管”，防止贫困反弹。因为有些贫困地区，摘帽之后，如果后续的各种政策没跟上的话，可能又会重新回到贫困状态，所以总书记提出“4 个不摘”，就是让脱贫变得更具备可持续性。在 2020 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这个政策是给已经脱贫县的定心丸。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全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逐步有序退出后可以有 5 年过渡期，来保持脱贫的成果可持续性。

在这 5 年过渡期究竟要做好哪些衔接工作？《意见》提供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政策，为全国各地做好衔接工作提出了更精准的工作指南，有利于各地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加强对已脱贫的有效监测防止大规模返贫，如何在已脱贫的西部地区设立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都已有明确的工作布置。

### **要完成三农工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虽说同为三农工作，但脱贫攻坚是解决温饱问题，而乡村振兴是解决富有问题，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是解决全国所有农民如何富有的问题，包括未来的农业如何高质高效，未来的乡村如何宜居宜业，未来的农民如何富裕富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差别很大，前者主要涉及 1 亿人脱贫问题，后者涉及 6 亿农民问题；前者涉及 12.8 万个贫困村，后者涉及 57 万个行政村；前者主要集中在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后者涉及全国 2800 多个县；前者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者着重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 **运用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真实记录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全面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深入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做法，生动展现了中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充分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担当。

过去的脱贫攻坚，大家都已经体会到了，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脱贫攻坚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要解决近 1 亿贫困人口问题，1 亿人口是什么概念呢？欧洲最大的人口大国是德国，才 8000 多万人，法国 6000 多万人，英国 5000 多万人，意大利 5000 多万人，所以我们过去的 8 年解决的贫困人口，比欧洲最大的国家还要多了 1000 多万人口。同样的道理，接下来的乡村振兴要解决惠及我们国家 6 亿农民的问题，让 6 亿农民都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数量又非常的庞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乡村振兴的力度、规模要比脱贫攻坚大很多。

脱贫攻坚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中，也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来推动。早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我们知道，不是任何国家战略都能享受到这样高规格待遇的，只有非常重大的问题才可能举全党与全社会之力来推动。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今天的乡村振兴与过去脱贫攻坚战一样，党政军民学齐动员，五级书记一起抓来促进我国乡村振兴的实施。

我国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政策创新。在国家层面上，我国过去几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七梁八柱”的重要文件都已经制定出来了，包括各个部委也都制定了乡村振兴的五年规划，各个省、市、县也都制定了本地的乡村振兴规划。前几年全国各个地方已经开展了三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随着 2021 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落地，预计还有很多更具体的文件将要出台。无论是村庄道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农村村容村貌改善等，还是需要有更具体的支持政策。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还是人、钱、地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更多进入城市的人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如何吸引更多人才留在乡村、乡村振兴的钱从哪里来、农村的地怎么才能带来更大的增值收益等。过去几年，国家脱贫攻坚中有很多新政策的探索，哪些政策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中可以直接移植过来，哪些政策需要新的背景下进行改革，这些都是有效衔接的一部分。要充分学习脱贫攻坚战的好的做法，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中国青年报）**

# 五大变化、三大挑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形势

张红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要求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的要求明确、任务明确，需要我们更加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

## 一、全党全社会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空前。

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走出了一条区别于美国的资源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模式，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第三条道路，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了三大成就：

一是全球 76 亿人，人均粮食、肉类、水产品的占有量分别是 350 公斤、43 公斤和 23 公斤。而中国粮食、肉类和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超世界平均水平 124 公斤、12 公斤和 23 公斤，这是中国了不得的农业成就。

二是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2020 年 9899 万贫困人口清零，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扶贫的相关要求。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包括 2018 年开始的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水、电、路、气、网等各方面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农村卫生厕所已经高达 65% 以上，全国范围 80% 的乡镇开始垃圾分类处理。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救助、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的公共事业也得到巨大发展。

为什么中国农业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离不开全党全社会对农业的高度重视。

党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总书记没有 1 个没去过。各级政府层层落实，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全社会共同关注，社会资本投入增加，去年全社会对工业的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但是对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 19.5%，这也证明了大家对农业非常看好。全国人民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逐渐形成。

## 二、外部环境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发展理念、政策、举措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之下，农业生产布局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来自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水利工程设施的修建，粮食和肉类生产“北粮南运”已成常态，“北猪南运”渐显趋势。资源性经济作物棉花、糖料等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例如全国棉花生产80%集中在新疆，甘蔗生产60%集中在广西，农业的集中化的程度越来越明显，模化程度越来越高。西南、东南等山区、丘区的特色农产品多元化生产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茶叶、药材、蔬菜、花卉、水果。都市群和城市郊区主要聚焦“菜篮子”产品生产，越来越讲究近距离运输，都市农业特点鲜明。

## 三、土地制度创新促使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以人民公社体制为历史起点，我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公有共营”、“公有私营”、“公有共享”三个阶段。“三权分置”的稳步推进，实践中形成了两条规模经营道路。2019年的数据表明，现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全国达到37%，绝对数量是5.51亿亩。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面积高达50%以上，家家有地，但是不一定家家种地，这就形成了两种规模体，一种是流转经营权产生了土地规模经营，一种是不流转土地经营权形成的服务规模经营，就是把作业环节委托给合作社或者农业企业。

## 四、科技进步引导着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稳产高产，止损减损。现代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集成的现代科技不断突破。以全面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资金高度密集为特征的农业工厂化模式迅速发展。

1978年中国的粮食亩产170公斤，去年中国的粮食亩产380公斤。1978年中国的水果总量657万吨，2019年我们的水果总量是2.75亿吨。这就是中国的生产能力，我们现在的核心生产能力就来自科学技术，来自单产水平的提升。

## 五、市场决定了要素组合的功能作用。

一是农业支持保护工具更加丰富。贸易格局、政策工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财政投入持续增加。2006年以后，我们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到现在我们构建起了以财政、金融、税收、保险、期货、债券、气候担保，我们的农业政策工具越来越丰富。

二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现在看得见的大型企业，没有不投资农业的，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华为也做农业，因为农业是值得深耕的蓝色大洋。只要你耐得住寂寞，只要有长线思维，农业就值得你投。

与此同时，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我国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三大挑战，需要有效应对，化解各类风险，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一、资源禀赋对产业安全约束越来越强。**

资源禀赋稀缺，回旋余地有限。人口压力持续增加，供需矛盾突出。我们一方面讲中国用世界 10% 的耕地养了世界 20% 的人口，提供了世界 25% 以上的粮食总量，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的资源是不足的。我们人口还在增加，生活水平提升，对食物结构产生多元化要求，吃鸡肉，两斤粮食换一斤，吃猪肉，3~4 斤粮食换一斤，我们就捉襟见肘。所以总书记强调保护耕地，保护黑土地。去年 9 月国办下发文件，提出 6 个“严格禁止”，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产业间资源有效配置矛盾难以调和。

### **二、国际贸易对产销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大。**

2020 年粮食产量达历史新高，但同期进口农产品依存度也达历史新高。据海关统计，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进口量达 1.43 亿吨，同比增长 28%。其中大豆进口超 1 亿吨，比上年 8851 万吨增长 13.3%。最近几年，棉花、糖料等资源性农产品进口量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 30% 左右。肉类进口量 991 万吨，同比增长 60.4%。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大国，按全部农产品进口数量观察，农产品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 30% 以上。

### **三、收入增长对共同富裕的意义越来越重。**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令人担忧。2020 年城乡间收入差距由 2019 年的 1:2.64 缩小到 2020 年的 1:2.56，与改革开放之初 1978 年的城乡收入比 1:2.56 持平。

二是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明显。2020 年农民收入最高的上海为 34911 元，收入最低的甘肃为 10344 元，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达 3.4 倍。

基于形势的分析判断，无论是做粮食、养殖还是贸易，都要对中国农业在国内经济背景下的地位、中国农业在全球的地位有所了解，有所把握，才能确定我们乡村振兴的任务是什么。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 实现“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发展纲要不能回避的三大问题

郭书田

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全面完成预期议程胜利闭幕。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使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产生恐慌，大肆攻击中国搞什么“疫病外交”，所谓“四眼联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首脑视频会议，目的是企图围堵中国，但由于反对之声甚为强烈，诡称不是针对中国。还有7G外长会议（美、英、法、德、日、澳、加）建立反华包围圈，默克尔则称“7G要与中国合作”。两会闭幕，国内各地、各部门直到基层在脚踏实地从本单位实际出发，认真落实，但从两会全过程观察，没有提到而不能回避的三个重大影响发展目标的“瓶颈”问题，值得重视与关注。

**第一，关于粮食安全问题。**历来两会都十分重视，这次也不例外，总的基调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不必担心。但只字未提粮食大量进口问题。2020年高达1.4亿吨，相当国内粮食产量的1/5，相对于全球粮食贸易量的1/3至1/2。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大国，把粮食安全寄托在大量进口上，岂能是粮食安全有保障？从主观愿望看是粮食市场供应有保证，不能让人们产生恐慌，引发社会不安定。但这种立足点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国内产量稳定在1.3万亿吨以上，人均400公斤以上，为何还要大量进口？这是由于进口粮食主要用于为了满足不断增长发展畜禽业的饲料粮需求，饲料粮也是粮食呀。不能认为只保证口粮的消费就保证了粮食安全，况且从最近几年进口的品种，主要是用于饲料粮的大豆与玉米，但水稻与大米也有进口，大麦与高粱的进口数量也很大。从进一步从深层次看，多年来为了追求产量而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的重大代价。实事求是认可这个具有危险性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必要的，而又是十分紧迫的，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其后果不堪设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的粮食1/5是靠进口，心里怎么会不慌呢？目前中国进口农产品所需土地面积约为8亿亩，相对于中国耕地面积的40%，对外开放力度再大，也不能认为这是安全的。

**第二，关于耕地保护问题。**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占用土地的。改革开放以来，农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达1亿亩以上。国家为了使耕地占补平衡，采取了征收土地占用税的政策，落实得不好，出现“赤字”，这是不应该出现而又的确是事实。最近又看到海外报刊提出中国房地产发展走了香港发展“楼市”之路，就是中国土地的拍卖和房地产开发制度源于香港。中国应避免重蹈香港楼市覆辙，这是很切中要害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贯彻与落实“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长期发展目标中，强调以拉动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方针，这是十分准确的。但从多年的实践看，方针房地产能收到1+1大于2的好处，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作为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巨大的驱动力，自然成

为最有效的选择。这种现象已经渗透到许多高等院校之中，扭曲了教育的方向，是很担忧的。加上房地产商炒作，加剧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最近还看到为加快城镇化，还要增加土地的供给，土地供给从何而来，自然来自农村。中央十分强调保护耕地 18 亿亩的红线绝不能突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扩展城镇对土地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还是会从农村下手的，由农村养活城镇，由农民养活市民，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鸿沟难以补平。从农民来说，中国农民对牺牲自己利益的事习以为常，从两会人员结构也能看出，代表农民利益的话语权也很少见，更难说议政参政了。我们城乡居民收入接近中等发展国家水平，这是城市把农村拉平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近 11 年来虽有缩小，但仍居高位，去年为 2.65:1，比最高的 2009 年的 3.33:1，年均缩小 0.06 点，2020 年为 0.08 点，如按此计算，达到平衡还需要 25 年。把土地出让收入留给农民，不是缩小差别的举措吗？去年的土地出让金高达 8 万亿元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我们能让这种不公平制度继续下去吗？

**第三，关于生态环境问题。**从两会情况看，对减少碳排放问题是关注的，但对城市与工业说得更多，对农村与农业说得少。应看到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包括农业在内的双位数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容易引起人们的关切，多为城镇与工业，对农村与农业的关切度，明显次于城镇与工业。其实农村与农业的污染远远大于城镇与工业，一是因为农村与农业的涉及面广而量大，二是尤其食品的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食品不安全问题或者说“隐患”是来自农村农业的。中国耕地占世界的 9%，而使用化肥量占世界的 30—40%，使用的农药占世界的 50%以上，不仅造成面广的面源污染，特别在饲料中使用带有镉等重金属的除草剂，造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短时间内难以消解，其危害性更大。虽然做到提前实现了化肥与农药的零增长，但存量基数太大。虽然在技术上问题不难解决，但由于大面积大量减降化肥与农药，就会造成产量的大幅下降，这对政府与农民都难以接受，这正是难点所在。我们所以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可以长驱直入到中国，我们虽然有劳动力价格低因素，但与规模经营小而物质消耗的成本过高，难有什么竞争优势。在物质成本中，重要的是化肥与农药以及机械中的油料，用量大而利用率又低，收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面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只能实事求是认可，而不能回避，更不能盲目乐观。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历史看，常常会遇到天灾加人祸交织在一起的灾难年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共克时艰，是能够战胜不论来自何方的挑战与风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以上三大难题也可以说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发扬敢啃硬骨头精神，能有坚强的政治魄力与智慧加以应对。有矛盾是正常的，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认可矛盾，躲避矛盾，最终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那种对中国的发展持悲观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资源不是短缺，而是由于观念与利益结构的错位形成的城乡与工农关系的制度失衡，资源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过大，相信这种局面总是要改变的。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级经济师，2021 年 3 月 12 日）**

---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